

朱熹詩文選評

本书责编：黄坦坦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福建南剑州（治所在今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出生。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别号晦庵、晦翁、逖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祖籍安徽徽州婺源县（今江西婺源）松岩里。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病危，临终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刘子羽，并留下遗言，叫朱熹向胡宪、胡勉之、刘子翠三人求教。朱松死后，朱熹遵嘱从福建建州（今建瓯）城南迁居崇安县五夫里，师事胡宪等三人。刘子羽等将他看作子侄，刘致

中还将女儿嫁给他。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二十三年，拜李侗为师。李侗受学罗从彦，是杨时再传弟子，而杨时则为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朱熹年轻时好佛、道之学，自入李侗之门，始专心儒学，致力于日用之间的切实工夫，他曾用“鸢飞鱼跃”四字，来概括自己这时学术思想的转变。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被任命为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在任三年。这是他第一次从政。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熹一直在崇安著述讲学。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孝宗（赵昚）即位，因国事日非，乃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壬午封事》。次年（隆兴元年），蒙孝宗召见，在垂拱殿奉事，连上三札，重申前议。这几篇奏议集中体现了朱熹早年的政治主张，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论帝王之学，希望孝宗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穷究事物之变，应接天下之务；二、论抗金复仇之义，强调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三、论本原之地，提出“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选守令”的主张。

孝宗淳熙五年（1178），朱熹被任命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次年到任。这是他第二次从政。当时正值灾荒，朱熹竭尽全力，筹办赈

济，减免赋税，修筑江堤，助民度荒。同时积极办学，在庐山修复了久已废弃的白鹿洞书院。淳熙七年，诏监司、郡守陈述民间利病。朱熹应诏上《庚子封事》，言天下大事，以体恤百姓为最，而体恤百姓之本，又在君王正心术、立纪纲；指责孝宗不信先王大道，亲近嗜利无耻之徒，不能体恤百姓、报仇雪耻。据史载，孝宗阅后，勃然大怒说：“这不是将我看作亡国之君吗！”淳熙八年，浙东饥荒，朱熹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在任期间，他访察民情，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暴敛的官吏，和兼并土地、拒绝赈粟的豪强，从各个方面赈灾救荒，并随时谋划，以为久远之计。

朱氏原为婺源著姓，但由于朱熹祖父以上三代都不曾出仕，故家境败落。朱熹父朱松长期被排挤，职位卑下，俸禄甚微，以至居无守所，死后安葬在公共庙田之中。朱熹迁居崇安，生活费用全靠刘子羽资助。他一生从政时间甚短，收入有限，平日生活十分节俭，加上长期居住乡间，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对他们怀有同情之心，故能在任职期间尽力做一些有利百姓的事。

朱熹在知南康军、出使浙东之时，有以身殉国意，故不畏危难，兴利除害。但当时腐败的官僚政

治，使他实在无法有所作为。特别是他在淳熙九年（1182）弹劾前知州唐仲友的不法后，唐的姻家宰相王淮顿时翻脸，极力诋毁朱熹，攻击道学。在这种打击下，朱熹再次提出辞呈。此后数年，一直闭门不出，潜心讲学；但忧国之意，实难去怀。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应召进京，有人在路上对他说：“当今皇上厌恶正心诚意之说，你千万别谈。”朱熹答道：“我生平所学，就只此四字，怎么可以隐藏在心中，欺骗皇上呢？”同年，他上了著名的《戊申封事》。在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宏文中，朱熹指出，当时天下大势如人重病在身，十分危险。认为天下大事本在君王之心，君王心思端正，天下之事就无一不正；君王心术不正，天下之事就无一能正。提出眼下最需急办的事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项。和以往一样，朱熹在封事中还痛斥了君王亲信、朝廷大臣的贪婪无能。朱松是个激进的抗金派，因上书反对议和，得罪秦桧，被排斥出朝，而为时人推重。朱熹自小就继承父志。在孝宗即位之初，他上封事，力主抗金，反对和议。而在这篇封事中，对此却置而不论。其原因在于：朱熹认为早先宋朝尚有恢复中原之望，此时由于纲维懈弛，国内矛盾重重，若不先整饬内务，根本就无力

抗击敌人。因此，不能说他当时已把抗战之事抛在脑后。实际上，他正是将端正君王心意、整饬国家纲纪，作为收复中原的前提。据史载，这篇封事上奏之时，孝宗已经就寝。看到封事后，则急忙起身，秉烛夜读，被朱熹的忧国热诚深深感动。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光宗（赵惇）即位。朱熹受命知漳州，次年（绍熙元年）到任。在任期间，朱熹破除了当地的一些陋俗。当时贫民失去产业，却仍须纳税；而富豪产业日多，纳税反少，因此苦乐不均，公私受弊。针对这种现象，朱熹提出“经界法”。其基本内容是，通过核实田亩以确定税额。由于这项措施触犯了地方豪绅的利益，故未能实行。绍熙四年（1193），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次年上任。尽管朱熹对下层民众的困苦怀同情之心，并且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农民暴动，都是由于饥饿和官吏的逼迫造成，但他还是反对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任期间，他用镇压、安抚、存恤等种种办法，平息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与此同时，朱熹还创办了岳麓书院，希望通过儒家教育，消除民众的反抗意识。

绍熙五年（1194），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由于宰相赵汝愚的推荐，朱熹任焕章阁待制

兼侍讲。他利用进讲之便，多次攻击执政韩侂胄。韩侂胄为太皇太后亲戚，且有拥立宁宗的决策之功。朱熹对韩的攻击，引起了宁宗的不满，同年将他罢职出朝，让他回福建建阳县居住。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次年遇害。韩侂胄指使党羽，上疏指控朱熹罪行，称道学为“伪学”。庆元四年，又订立“伪学逆党籍”，“伪学”进而变为“逆党”，史称“庆元党禁”。当时朝廷对所谓党人排挤诋辱，可谓无所不至，使得人人自危，以至无所容身。朱熹也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各处避难。但在此期间，他仍不忘著述讲学，直到临终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及《楚辞集注》。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在福建建宁府建阳县考亭沧洲精舍去世，年七十一岁。十一月，被安葬在建阳唐石里（今黄坑）大林谷九峰山下。

二

朱熹的一生，从政时间前后共计才七年，立朝仅四十余日，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朱熹所以能名重一时并影响后人，在于他对当时所有的学说进行了分析研究，综合扩充，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

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戴震指出，理学的“理”，实从道、佛的“真宰”、“真空”转化而来。宋代理学家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取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将“理”看作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万物产生的本原，其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理学。

朱熹哲学的基石是理气说。理为形而上之道，气为形而下之器。理是先天的、永恒的，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本原。理始终处在“动静无端”的循环运动中。经过自我分化运动，理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物质性的气。故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但理为气主，理在气先。

理在产生气之后，便作为气的本体或本质存在于气之中，人是理与气结合的产物。人所禀赋的天理产生“天命之性”（道心），而所禀赋的气质则产生“气质之性”（人心、人欲）。朱熹继承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论，认为气质之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以天理克服人欲，用道心主宰人心。

朱熹的认识论是“格物致知”说，格物的目的是致知。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但要穷尽抽象

的理，却离不开具体的物。故朱熹说，他的学问乃铢积寸累而成。出于穷理尽性的需要，朱熹还主张以践实（即躬行实践）和居敬（即遇事专一）为主要的修养功夫。

朱熹经常提及事物的对立性，看到自然界的现象有阴阳、昼夜、清浊、高下、大小等差别。他指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在一个统一体中，必然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的对立面；正是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才促成了万物的发展和变化。他对《周易》中“化而裁之谓之变”一语，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事物运动的形式有“化”和“变”两种，“化”是渐渐转变的量变，“变”是前后截然不同的质变；这种“变化”，也是相对的，不可分割的。在他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中，不乏辩证的思想。

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可是《十翼》在解释经文上却多依据义理，故解《易》应该象数与义理并重。他受到当时民间文艺的影响，力破《诗序》的穿凿之弊，就诗论《诗》，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风》中有不少淫诗，对后人进一步从纯文学的角度研究《诗》有启发的作用。就《春秋》而言，他对传统注疏的穿凿附会十分不满，认为圣心正大，不应如是。朱熹研究“五经”，完全不受传统

的束缚，而以自己独特的眼光进行研究，从中显示出他超人的识见。朱熹一生精力，主要在讲解“四书”，剖析疑似，辨别毫厘，阐扬微言大义。他以自己的哲学解释《大学》、《中庸》，极力说明格物、穷理的重要，将“诚”说成是宇宙与人生二者之间一贯的原理。前人认为，理学的根本精神，就体现在朱熹对这些经籍的注释之中。

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和陆九龄、陆九渊在信州（州治在今江西上饶）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异同。这次会晤，充分反映出理学内部以朱熹为代表的（狭义）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之间的重大分歧。朱熹认为天地万物都禀理而生，心则是天理的体现。由于心常为物欲所蔽，故要使心复归于明，必须就事事物物穷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心就是理，把心直接看作世界的本体，人的认识只需通过内检省察的功夫，无用外求；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我”和我的理性——心。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宇宙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陆九渊主张“尊德性”，批评朱熹学派不求诸本心，而专意于名物度数的追求，只是一种艰难支离、劳而无功的事业。朱熹则认为不能专谈“尊德性”而不重“道问学”。他指出治学的方法，最好是居敬（存心）和穷理（致知）二者的并

用，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中来启发内心的知识。他还批评陆九渊的言论全是禅学，只是变其名号而已。

孟子提出有两种治道：王道和霸道。朱熹认为，三代帝王行天理，是王道；汉唐以来行人欲，是霸道。因为后来的统治者，都只是满足自己的淫欲，而不顾百姓的利益。儒家在政治上以德治为基本主张，朱熹以儒家正统继承者自命，必然主张依据仁心，施行仁政，将道义作为一切政治设施的准则。认为一切急功好利的措施，以及权谋术数之用，都应在排斥之列。由此，他批评了陈亮等人的事功之学。同时，他也遭到了功利派的反批评。陈亮等人明确指出：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根本无补于国计民生，提出一切应以实用为主，以合时宜为主。朱熹所注重的，确实是超现实的、抽象的理。但他行天道、植纲常的政治伦理观，对激发民族意识、培养浩然正气，却能起一定的作用。后来的民族英雄如文天祥、谢枋得、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笃信朱学，受其影响，便是很好的说明。

据史载，朱熹刚会说话时，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朱熹就问道：“天上面又是什么？”朱熹自称，他还在五六岁时，就已为天地外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而烦恼。正是这种好疑和钻研精